执中建极：河汾经学概论

张 沛

在中国儒学史上，王通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没有他，隋代儒学势必黯淡许多，甚或乏善可陈。

王通字仲淹，生于隋开皇四年（公元584年），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卒，门人私谥“文中子”。王氏生前著有《续经》六种（又称《续六经》、《王氏六经》）¹，今已佚²，唯弟子记录的《中说》一书存世。凭此一书，名不见《隋书·儒林传》的王通被后世尊奉为一大儒。如宋儒陆象山称：“孟子之后，以儒称于当世者，荀卿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四子最著。”（《策问》）明儒王阳明认为：“予尝论文中子盖后世之大儒也，自孔、孟既没，而周、程未兴，董、韩诸子未或有先焉者。”（《书同门科举提名录后》）近代学者谢无量也指出：“隋既统一南北，而其时学者仍以华藻相高，经术之士局于训诂，玄释并行。惟文中子明儒业，其言甚醇参于汉之扬、董，而魏晋以来未有能及之者也。”³

儒家之学，根本在经学，所谓“儒者以六艺为法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。王通之为一代儒宗，端在其经学建树：所谓“河汾之学”⁴，实即王氏开创的经学传统。那么，王通的经学成就究竟为何？它怎样形成，又有何独到殊胜之处？此即本文将要讨论的内容

一、家学渊源

王氏出自太原，世居晋阳。王通十九世祖王霸，太原广武人，因王莽篡乱，洁身不仕。霸长子殷为云中太守，家于祁。殷四传而有述，曾著《春秋义统》。述三传而有宏，宏自河东北迁新兴（今山西代县西北）。传而有寓，遭永嘉之乱，迁居江左。寓生牢，牢生秀，皆以文学显。秀生二子：长曰玄谟，次曰玄则。玄则即王通之六世祖。⁵据《文中子世家》记载：

¹ 它们是：《礼论》二十五篇，《乐论》二十篇，《续书》一百五十篇，《续诗》三百六十篇，《元经》五十篇，《赞易》七十篇。（参见杜淹《文中子世家》）

² 唐人言《续经》大多语焉不详，似未见其书。北宋司马光称“今其六经皆亡”（《文中子补传》），然而稍后张耒称“读通所著《续经》”云云（《答李文叔为兄立谥简》），洪迈亦称：“《元经》、《续诗》《书》犹有存者，不知能出迁、固之右乎？”（《容斋四笔卷第十一·讥议迁史》）又似尚有存者。《元经》宋时已残，今本《元经》系后人伪作，古人早有定论，如南宋邵博称：“世传王氏《元经》、薛氏《传》、关子明《易》、《李卫公问对》皆阮逸拟作。”（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五）

³ 谢无量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，第800-801页。

⁴ 参见薛收《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》：“要道之本，中和之节，九畴六艺之能事，元亨利贞之至美，悉备之矣。……可以比姑射于尼岫，拟河汾于洙泗矣。”

⁵ 参见骆建人：《文中子研究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90年，第25-31页。

玄则字彦法，即文中子六代祖也。仕宋，历太仆、国子博士。常叹曰：“先君所贵者礼乐，不学者军旅，兄何为哉？”遂究道德，考经籍，谓“功业不可以小成也”，故卒为洪儒；“卿相不可以苟处也”，故终为博士；曰“先师之职也，不可坠”，故江左号“王先生”，受其道曰“王先生业”。于是大称儒门，世济厥美。

玄则生焕（后代称“江州府君”）。焕生虬，因南齐萧道成代宋，于公元479年（齐高帝建元元年，魏孝文帝太和三年）奔至北魏，任并州刺史，始家河汾，后代称“晋阳穆公”¹。虬生彦，曾任同州刺史，后代称“同州府君”²。彦生一（或说名杰³），曾任济州刺史，后代称“安康献公”⁴。一生隆，即王通之父，曾为隋国子博士，后代称“铜川府君”⁵。自玄则以降，王氏世守儒业，以经学传家。王通续成《六经》后，曾感慨陈言：

甚矣，王道难行也！吾家顷铜川六世矣，未尝不笃于斯，然亦未尝得宣其用。退而咸有述焉，则以志其道也。盖先生之述曰《时变论》六篇，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。江州府君之述曰《五经决录》五篇，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。晋阳穆公之述曰《政大论》八篇，其言帝王之道著矣。同州府君之述曰《政小论》八篇，其言王霸之业尽矣。安康献公之述曰《皇极谏义》九篇，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。铜川府君之述曰《兴衰要论》七篇，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。余小子获睹成训，勤九载矣。服先人之义，稽仲尼之心，天人之事，帝王之道，昭昭乎！（1.1）⁶

后又告弟子董常：

吾欲修《元经》，稽诸史论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皇极谏义》焉。吾欲续《诗》，考诸集记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时变论》焉。吾欲续《书》，按诸载录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政大论》焉。董常曰：“夫子之得，盖其志焉？”子曰：“然。”（1.2）

¹ 参见《文中子世家》：“虬始北事魏，太和中为并州刺史，家河汾，曰晋阳穆公。”《录关子明事》：“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，不平袁粲之死，耻食齐粟，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，即齐建元元年，魏太和三年也，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。奏事曰：大安四载，微臣始生。盖宋大明二年也。……太和八年，征为秘书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……俄帝崩，穆公归洛，逾年而薨，其道遂不得行。”

² 王绩《游北山赋序》：“同州悲永安之事，退居河曲。”《文中子世家》：“穆公生同州刺史彦，曰同州府君。”所谓“永安之事”，指魏永安三年（公元529年）孝庄帝诛权臣尔朱荣，尔朱氏遂作乱。是年十二月，尔朱兆、尔朱度律袭京城，逼帝幸永宁佛寺，后迁至晋阳，杀害于城内三级寺（《魏书·孝庄纪》）。

³ 司马光《文中子补传》：“彦生杰，官至济州刺史。”（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四）

⁴ 王绩《游北山赋序》：“始则晋阳开国，终乃安康受田。”《文中子世家》：“彦生济州刺史一，曰安康献公。”

⁵ 《文中子世家》：“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，讳隆，字伯高，文中子之父也，传先生之业，教授门人千余。隋开皇初，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。……每奏，帝称善，然未甚达也。府君出为昌乐令（今河南南乐县），迁猗氏铜川，所治著称，秩满退归，遂不仕。”

⁶ 即《中说》第一卷第一章。下引同。

并说：

周、齐之际，王公大臣不暇及礼矣。献公曰：“天子失礼则诸侯修于国，诸侯失礼则大夫修于家。”礼乐之作，献公之志也。（6.28）

另据《文中子世家》载：

开皇九年，江东平。铜川府君叹曰：“王道无叙，天下何为而一乎？”文中子侍侧，十¹岁矣，有忧色曰：“……夫子之叹，盖忧皇纲不振，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？”铜川府君异之曰：“其然乎？”遂告以《元经》之事，文中子再拜受之。

由此可见，《续经》之作实为王氏祖孙七代三百年继志接力的产物。在中国学术史上，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壮举了！

二、自得成家

王通家学渊源，已是得天独厚，但他并不满足于拘守家传之学，更转益多师，以求深造精进。他十五岁时“有四方之志”，“受《书》于东海李育，学《诗》于会稽夏瑱，问《礼》于河东关子明，正《乐》于北平霍汲，考《易》于族父仲华，不解衣者六岁”（《文中子世家》）²，弱冠之年即已成为享誉当时的杰出学者。如《中说·礼乐篇》载：

越公初见子，遇内史薛公曰：“公见王通乎？”薛公曰：“乡人也。是其家传七世矣，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。”越公曰：“天下岂有七世不逢乎？”薛公曰：“君子道消，十世不逢有矣。”越公曰：“奚若其祖？”公曰：“王氏有祖父焉，有子孙焉；虽然，久于其道，钟美于是也。是人必能叙彝伦矣。”（6.22）

这里说的“越公”指杨素（杨素因平陈之功封越国公），“内史薛公”指薛道衡（薛时任内史侍郎）。王通于仁寿三年（603年）初春赴长安，上《太平十二

¹ “十”为“六”之误（《文中子世家》前云“开皇四年，文中子始生”，后称“仁寿三年，文中子冠矣”，是则开皇九年时王通虚龄六岁），当是字形漫漶，手民误植所致。

² 王通自称：“吾闻礼于关生，见负樵者几焉；正乐于霍生，见持竿者几焉。”（8.38）可相参证。

策》，不用而归，“越公初见子”应该就在这个时候。是年王通虚龄二十，但已被视为“久于其道，钟美于是”而“必能叙彝伦”了¹。再如《中说·关朗篇》载：

王珪从子求《续经》，子曰：“叔父，通何德以之哉！”珪曰：“勿辞也。当仁不让于师，况无师乎？吾闻关朗之筮矣：积乱之后，当生大贤。世习礼乐，莫若吾族；天未亡道，振斯文者，非子谁欤？”（10.6）

这里说的“关朗之筮”，其事见《录关子明事》：王通高祖王彦忧心国事，请关朗预卜将来，朗揲蓍布卦，遇《夬》之《革》，曰：“黄初元年庚子，至今八十四年，更八十二年丙午，三百六十六矣，达者当生。更十八年甲子，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，不用，洙泗之教修矣。”这好像佛教的“悬记”，预言了圣人的降生。果然，“开皇四年，铜川夫人经山梁，履巨石而有娠，既而生文中子，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。献公筮之曰：‘此子当之矣。’”（《录关子明事》）“铜川府君筮之，遇《坤》之《师》，献兆于安康献公。献公曰：‘素王之卦也、何为而来？地二化为天一，上德而居下位，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。虽有君德，非其时乎？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。’遂名之曰通。”（《文中子世家》）可以想见，王氏家族对王通寄予了怎样的厚望！而王通也确实不负众望，集六代家学之大成，更深造自得而开创河汾之学。王氏经学名家，《续经》之“作”固无论矣，即其所“述”亦见修养之深：

门人有问姚义：“孔庭之法，曰《诗》曰《礼》，不及四经，何也？”姚义曰：“尝闻诸夫子矣：《春秋》断物，志定而后及也；《乐》以和，德全而后及也；《书》以制法，从事而后及也；《易》以穷理，知命而后及也。故不学《春秋》无以主断，不学《乐》无以知和，不学《书》无以议制，不学《易》无以通理。四者非具体不能及，故圣人后之，岂养蒙之具邪？”或曰：“然则《诗》、《礼》何为而先也？”义曰：“夫教之以《诗》，则出辞气，斯远暴慢矣；约之以《礼》，则动容貌，斯立威严矣。度其言，察其志，考其行，辩其德。志定则发之以《春秋》，于是乎断而能变；德全则导之以《乐》，于是乎和而知节；可从事，则达之以《书》，于是乎可以立制；知命则申之以《易》，于是乎可与尽性。若骤而语《春秋》，则荡志轻义；骤而语《乐》，则喧德败度；骤而语《书》，则狎法；骤而语《易》，则玩神。是以圣人知其必然，故立之以宗，列之以次：先成诸己，然后备诸物；先济乎近，然后形乎远。亶其深乎！亶其深乎！”（9.6）

¹ 杨素、薛道衡议论之言，何人与闻，而传告者谁？此与鉏麴感叹触槐之事相类，不过小说家言耳。虽然，“久于其道，钟美于是，必能叙彝伦”云云，必当时族人乡里之公论，《中说》编者方有如此一番造作。

王通论《六经》进学阶次，与古人不尽相同¹，盖其深造自得语。民国学者钟泰认为：“仲淹书之最精者，莫过于言六经之次。……自《礼记·经解》之后，未有若斯之剀切著明者也。”（《中国哲学史》）²可谓解人知言。

三、抱负朝野³

王通经学既成，颇有用世之志。仁寿元年（公元602年），王通秀才高第，次年任蜀郡司户书佐、蜀王侍读。蜀王杨秀，隋文帝第四子，仁寿二年被废。史载太子杨勇诏令名儒刘焯事秀，焯不至，杨秀大怒，遣人枷送于蜀，配之军防；又敕令名儒刘炫事之，迁延不往，秀大怒，枷送益州，配为帐内，使执杖为门卫（《隋书·儒林列传》）。待士如此，可发一噓，而王通在蜀之境况，亦可想而知矣。仁寿三年（603年）初春，王氏返乡途经长安，伏阙上《太平十二策》，事见《文中子世家》：

仁寿三年，文中子冠矣，慨然有济苍生之心，西游长安，见隋文帝。帝坐太极殿召见，因奏太平策十有二，策尊王道，推霸略，稽今验古，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。

《中说》亦载：

子谒见隋祖，一接而陈十二策，编成四卷。（8.26）

董常曰：“子之《十二策》奚稟也？”子曰：“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此其稟也。”董常曰：“噫，三极之道，稟之而行，不亦焕乎！”子曰：“《十二策》若行于时，则《六经》不续矣。”董常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仰以观天文，俯以察地理，中以建人极：吾暇矣哉，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。”（7.37）

子谓薛收曰：“元魏已降，天下无主矣。开皇九载，人始一。先人有言曰：

¹ 古人言六经之序：《庄子·天下》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《礼记·经解》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《荀子·儒效》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，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，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及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两种，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分为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及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两种，杨雄《法言·寡见》为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为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易》。

² 钟泰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东方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69页。（按：本书初版于1929年。）

³ 《老子》四十二章：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标题中“抱负”二字取义于此。

‘敬其事者大其始，慎其位者正其名。’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：‘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，必绍周汉，以土袭火，色尚黄，数用五，除四代之法，以乘天命。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。’高祖伟之而不能用。所以然者，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。故十二策何先？必先正始者也。（10.21）

王通自称“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”（10.21），“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”云云，俨然以大圣自居，然观其所陈，不过秦汉五德之说之绪余。其上书隋文，纯仿汉朝贾谊故事。贾谊以汉兴至汉文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当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，乃悉草具其事仪法，色尚黄，数用五，为官名，悉更秦之法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），后人称“其术固以疏矣”（《汉书·贾谊传第十八》）。隋文受禅，自居火德，朝会之服、旗帜牺牲尽令尚赤（《隋书·高祖纪上》），暮年更不悦儒术而专尚刑名（《隋书·儒林列传》、《北史·儒林传上》）；王通此时说以“土德”，可谓“疏”而不识时务¹。后来有人请习《十二策》，王氏辞以“时异事变，不足习也”（8.26），盖知悔矣。

长安之行是王通一生的重要转折点。通过实地考察，他对现实政治有了清醒的认识。《中说》记载：

子在长安，杨素、苏夔、李德林皆请见。子与之言，归而有忧色。门人问子，子曰：“素与吾言终日，言政而不及化；夔与吾言终日，言声而不及雅；德林与吾言终日，言文而不及理。”门人曰：“然则何忧？”子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，今言政而不及化，是天下无礼也；言声而不及雅；是天下无乐也；言文而不及理，是天下无文也。王道从何而兴乎？吾所以忧也。”（1.11）

按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一年（公元591年），王通仁寿三年游长安（公元603年），其时德林死已多年，请见之事决不可信²。其事或有（谓“归而有忧色”，当是王通谒见他人），其人则伪托无疑。此盖庄子“寓言”之类，作者借机说法读者正不妨得意而忘言。

王通对时政深感失望，于是隐居不出，潜心著述讲学；后来朝廷和地方

¹ 宋儒于王通上书隋文之事多有责备，如朱熹以为：“……一见隋文而陈十二策，则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为伊、周，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为汤、武，且不待其招而往，不待其问而告，则又轻其道以求售焉。”（《王氏续经说》）再如杨时曰：“隋文方奖用奸邪，废嫡立庶，父子相鱼肉，王通乃诣阙献《太平十二策》不几于于时求进乎？其不用也宜哉。”（《龟山先生语录》，引自《永乐大典》卷六千八百三十八）王通自谓“千载一时”，实则昧于时事。

² 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、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卷五于此已有考辨。另见尹协理、魏明《王通论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50页）、徐朔方《王通门人辨疑》（《浙江大学学报》第29卷第4期，第7页）。

（如杨玄感政权）多次征召，均辞不就¹。作为在野儒家的代表，王通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——此“魏阙”并非隋廷，而是他理想中的王道盛世。因此，他一方面声称“君子不贵得位”（8.47）、“吾将退而求诸野矣”（8.38），一方面又以天下为心，所谓“以万古为兆人，五常为四国，三才九畴为公卿”（8.7）。在学术上，他一方面坚持民间立场²，一方面又恪守精英取向。如他对当时名儒刘炫的态度即是一例：

刘炫见子，谈《六经》，唱其端，终日不竭。子曰：“何其多也！”炫曰：“先儒异同，不可不述也。”子曰：“一以贯之可矣，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？”炫退，子谓门人曰：“荣华其言，小成其道，难矣哉！”（4.21）

刘炫问《易》，子曰：“圣人于《易》，没身而已，况吾侪乎？”炫曰：“吾谈之于朝，无我敌者。”子不答，退谓门人曰：“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”（5.1）

刘炫（约546-约613）字光伯，河间景城（今河北献县东北）人，隋代大儒，与刘焯并称“二刘”，文帝时曾奉敕参修国史及天文律历，炀帝时任太学博士。史称刘炫聪明博学，然性躁竞，多自矜伐，好轻侮当世，如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，炫伪造书百余卷，题为《连山易》、《鲁史记》等，送官取赏，事发除名（《隋书·儒林列传》）。刘炫是当朝儒士和官方经学的代表人物，他比王通年长近四十岁，又自视甚高，因此亲来“见子”、“问《易》”云云多不可信，但认为“学者，博诵云乎哉？必也贯乎道”（2.8）的王通私下将其作为“小人儒”的代表而口诛笔伐，却是理有必然之事。他对刘炫的批判——“荣华其言，小成其道，难矣哉”和“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”，其实正是他作为在野儒对在朝儒的一个总体评判³。可以说，二者的分歧象征了隋代儒学的朝野分化。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看，则其不仅是汉代经学古今之争的余波重演，同时也成为宋代道学朱陆之争的嚆矢先声。

四、综衡南北

本文所云“南北”，兼指经学之南北与地缘政治之南北。

¹ 《文中子世家》：“大业元年，一征又不至，辞以疾。……大业十年，尚书召署蜀郡司户，不就。十一年以著作郎、国子博士征，并不至。”参见《中说》2.17、3.4、3.18、8.5等章。

² 王通躬耕田亩（2.22），“乡人有水土之役，则具畚鍤以往，曰‘吾非从大夫也’”（3.39），其人自居平民身份、坚持民间立场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³ 《隋书·儒林传》称：“爰自汉、魏，硕学多清通，逮乎近古，巨儒必鄙俗。”此语正堪为王通之说作注。

魏晋以降，政权南北分立，经学亦分为南北，宗尚各有不同，如《隋书·儒林列传》所述：

自晋室分崩，中原丧乱，五胡交争，经籍道尽。魏氏发迹代阴，经营河朔，得之马上，兹道未弘。暨夫太和之后，盛修文教，搢绅硕学，济济盈朝，缝掖巨儒，往往杰出，其雅诰奥义，宋及齐、梁不能尚也。南北所治，章句好尚，互有不同。江左《周易》则王辅嗣，《尚书》则孔安国，《左传》则杜元凯。河洛《左传》则服子慎，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则郑康成。《诗》则并主于毛公，《礼》则同遵于郑氏。大抵南人约简，得其英华，北学深芜，穷其枝叶。考其终始，要其会归，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。

隋朝统一中国后，经学亦归一统。清末学者皮锡瑞认为：

隋平陈而天下统一，南北之学亦归统一，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；天下统一，南并于北，而经学统一，北学反并于南，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。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，无北学。¹

此指官方经学而言，民间经学未可一概而论，河汾之学即是著例。钱穆先生以为王通得“当时北方儒学之真传统”，乃“当时北学传统中之殿军与结穴”（《孔子与春秋》）²，其言可补皮说之不足。其实王通之学融汇南北而自成一家。如前所述，王氏世居晋阳，因永嘉之乱迁居江左，凡六代，王虬奔魏，始家河汾，历经四代而有王通；王氏辗转南北，于两地人文均有“同情之了解”。如王通自称“宗周之介子”（8.14）³，然“子之家庙，座必东南向，自穆公始也，曰‘未忘先人之国’”（4.16），则又以江东为故国。裴晞问穆公奔魏之事，王通曰：“舅氏不闻凤皇乎？览德晖而下，何必怀彼也？”（7.17）又曰：“太和之政近雅矣，一明中国之有法。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。”（5.12）其家国情怀如此。职是之故，其学亦综衡南北而以天下为心。王通经学，实以《续经》为大宗；《续经》之中，则以《元经》居首。王氏自称“修《元经》以断南北之疑”，其法是“感帝制而首太熙，尊中国而正皇始”⁴（10.9），如《中说》记述：

¹ 皮锡瑞：《经学历史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135页、137页。

² 钱穆：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289页。

³ 王通弟王绩《游北山赋序》曰：“我周人也。”王通孙王勃诗云：“倬彼我系，出自有周。”是知“周人之后”实为王氏家族之共识。

⁴ 太熙：晋惠帝年号（公元290年）。皇始：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年号（公元396-398年）。皇始二年拓跋珪灭后燕，统一黄河以北地区。

薛生曰：“殒之后，帝制绝矣，《元经》何以不兴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帝制，并心一气以待也，倾耳以听，拭目而视，故假之以岁时。桓、灵之际，帝制遂亡矣；文、明之际，魏制其未成乎？太康之始，书同文、车同轨，君子曰‘帝制可作矣’，而不克振。故永熙之后，君子息心焉，曰：‘谓之何哉？’《元经》于是不得已而作也。”（5.50）¹

子曰：“《元经》其正名乎！皇始之帝，征天以授之也。晋、宋之王，近于正体，于是乎未忘中国，穆公之志也。齐、梁、陈之德，斥之于四夷也，以明中国之有代，太和²之力也。”（5.47）

董常曰：“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主中国者，将非中国也。我闻有命，未敢以告人，则犹伤之者也。伤之者，怀之也。”董常曰：“敢问卒帝之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贵其时，大其事，于是乎用义矣。”（7.10）

叔恬曰：“敢问《元经》书陈亡而具五国³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江东，中国之旧也，衣冠礼乐之所就也。永嘉之后，江东贵焉，而卒不贵，无人也。齐、梁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。及其亡也，君子犹怀之，故书曰‘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亡’，具五以归其国，且言其国亡也。呜呼，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！”叔恬曰：“晋、宋亡国久矣，今具之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衣冠文物之旧，君子不欲其先亡；宋尝有树晋之功，有复中国之志，亦不欲其先亡也。故具齐、梁、陈以归其国也，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。”曰：“中国之礼乐安在？其已亡，则君子与其国焉？”曰：“犹我中国之遗人也。”叔恬曰：“敢问其志。”文中子泫然而兴曰：“铜川府君之志也，通不敢废。书五国并时而亡，盖伤先王之道尽坠。故君子大其言，极其败，于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。‘期逝不至，而多为恤’，汝知之乎？此《元经》所以书也。”（7.13）

《元经》“断南北之疑”，权衡王道（3.25）而立皇极（8.10），故为“天下之书”（8.11）；王通以天下为心，综衡南北，一明中国之法，其学所以为大中之学。

¹ 殒：汉殇帝刘隆，嗣位时年方百日，越年而崩。桓、灵：汉桓帝与汉灵帝。文、明：魏文帝曹丕与魏明帝曹叡。太康：晋武帝司马炎年号（281-289）。永熙：晋惠帝司马衷年号（290）。惠帝昏庸，于是有八王五胡之乱，此后中原板荡，晋室偏安。

² 太和：魏孝文帝年号（477-499）。

³ 五国：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。

五、凌轹今古

清人汪缙以为：“河汾之学，经世之学也。”（《汪子遗书·上录·明尊朱之指》）近代学者谢无量亦称：

文中子之所言，固纯然祖述儒家，然亦慨然有制作之意。……盖实欲兴素王之业、大礼乐之效以济当世……则文中子经纶之怀，非与缺缺抱训诂校文字者同矣。¹

所言甚是。按王通自云：

吾视千载已上，圣人在上者，未有若周公焉：其道则一，而经制大备，后之为政，有所持循。吾视千载而下，未有若仲尼焉²：其道则一，而述作大明，后之修文者，有所折中矣。千载而下，有申周公之事者，吾不得而见也；千载而下，有绍宣尼之业者，吾不得而让也。（2.35）

王通以圣人自任，著述皆以经世为念，如《中说》载记：

程元问《六经》之致，子曰：“吾续《书》以存汉晋之实，续《诗》以辩六代之俗，修《元经》以断南北之疑，赞《易》道以申先师之旨，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，如斯而已矣。”（6.29）

子曰：“《十二策》若行于时，则《六经》不续矣。”董常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仰以观天文，俯以察地理，中以建人极：吾暇矣哉，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。”（7.37）

钱穆先生认为王通“真想以一人之家言，将来成为新王之官学”，“不失是西汉公羊家精神”（《孔子与春秋》）³，可谓片言居要。王氏自称：“问则对，不问则述，窃比我于仲舒。”（8.28）董仲舒治《公羊》学，为今文经学大师；王通自比董仲舒，其学可想而知。虽然，王氏自以直接孔子之道，初不以古今家法为

¹ 谢无量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上海中华书局，1916年，第48页。

² 晚清学者俞樾以为：“此本作‘吾视千载已上，圣人在下者，未有若仲尼焉’，与上文‘吾视千载已上，圣人在上者，未有若周公焉’，两文一律。”（《诸子平议补录卷十二·文中子》）可备一说。

³ 钱穆：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289页。

意。如《公羊》讥世卿，而王通见牧守屡易，曰：“三代之兴，邦家有社稷焉；两汉之盛，牧守有子孙焉。不如是之亟也。无定主而责之以忠，无定民而责之以化虽曰能之，末由也已。”（3.14）又称：“必也崇贵乎！”（6.1）古文经学重《周礼》，而《中说》记载：

子居家，不暂舍《周礼》。门人问子，子曰：“先师以王道极是也，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。”（8.14）

大有古文家风。然刘向为古文经学元勋鼻祖，而王通斥之曰：“《春秋》之失，自歆、向始也，弃经而任传。”（2.43）又称：“《书》残于古今，《论》失于齐鲁。”

（2.44）按东汉王充放言：“经之传不可从，《五经》皆多失实之说。”（《论衡·正说》）荀悦亦云：“仲尼作经，本一而已；古今文不同，而皆自谓真本经。古今先师，义一而已；异家别说不同，而皆自谓古今。”（《申鉴·时事》）王通所说，与之一揆。再如“门人有问姚义”一章（见前），王氏言《六经》进学阶次非今非古¹，其学固凌轹今古而自成一家矣。

六、平准经传

《庄子·天下》论衡诸子之学，称：“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、古人之大体，道术将为天下裂。”其实学术无不有流变衍化²，儒学犹然。孔子生前，儒家内部已有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之分科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；孔子之后，“儒分为八”而“取舍相反不同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“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：

昔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故《春秋》分为五，《诗》分为四，《易》有数家之传。……后世经传既已乖离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，至于二三万言。后进弥以驰逐，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；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，终以自闭。

传说师法不同，于是有古今之争、南北之异，“皆自谓真本经”（《申鉴·时

¹ 今文经学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为序，由浅而深；古文经学则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，自古及今。王通以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乐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为序，意在“先成诸己，然后备诸物，先济乎近，然后形乎远”（9.6），自出机杼而不违古人之意。

² 黑格尔所谓“异化”、“差异的内在发生”，德里达所谓“延异”、“替补”。

事》)而“《五经》并失其实”(《论衡·正说》)。经学至此,亦可谓衰矣!王通自命圣人,素以“振颓纲”(7.21)为己任。《中说》记载:

子曰:“盖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,三传作而《春秋》散。”贾琼曰:“何谓也?”子曰:“白黑相渝,能无微乎?是非相扰,能无散乎?故齐韩毛郑,《诗》之末也;大戴小戴,《礼》之衰也;《书》残于古今,《论》失于齐鲁¹。汝知之乎?”贾琼曰:“然则无师无传可乎?”子曰:“‘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’,‘苟非其人,道不虚行’。必也传又不可废也。”(2.44)

所谓“九师”,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淮南王安聘明《易》者九人,号九师说。”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合称“三传”,“齐韩毛郑”指西汉辕固生、韩婴、大小毛公(毛亨和毛萇)和东汉郑玄,“大戴小戴”指汉礼经博士后仓弟子戴德、戴胜,“齐鲁”指《齐论》与《鲁论》(《论语》有《古论》、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三家其中《古论》二十篇,《齐论》二十一篇,《鲁论》二十二篇;汉武帝之后,三家渐融为今论之二十篇)。王通以为“《春秋》之失,自歆、向始也,弃经而任传”,称范宁“有志于《春秋》,征圣经而诂众传”(2.43),今谓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、三传作而《春秋》散、齐韩毛郑《诗》之末、大戴小戴《礼》之衰、《书》残于古今、《论》失于齐鲁,其说一如。后世(如啖助、孙复)舍传求经之风,实由此而渐。

近人钟泰认为:“抑仲淹虽用经,而不取传。……以神契为自得。斯传记者,糟粕视之矣。是则上结六朝谈玄之局,下开宋儒心学之端。”²议论即据本章。王通虽以弃经任传为非,并不尽废传。如贾琼问:“无师无传可乎?”曰:“‘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’,‘苟非其人,道不虚行’。必也传又不可废也。”盖微妙之意,可以性通,难以言论(《三国志·方伎传·管辂传》),今之所读者,古人之陈迹耳,故学贵神会自得。黄宗羲曰:“古今学有大小,盖未有无师而成者也。然儒者之学,孟轲之死,不得其传,程明道以千四百年得之于遗经。董仲舒、王通顾亦未闻其何所授受。”(《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》)北魏陈仲儒曰:“知之者欲教而无从,心达者体知而无师,苟有一毫所得,皆关心抱,岂必要经师受然后为奇哉!”(《资治通鉴·梁纪五·武帝天监十八年》)孟子曰:“君子深造之以道,欲其自得之也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弘道唯人,故曰:“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”,“苟非其人,道不虚行”。虽然,经者传之本,传者经之用;传以传经,经因传传。故曰:“传又不可废也。”此与西方阐释学(如所谓“在的扩

¹ 原本作“《诗》失于齐鲁”,据龚鼎臣本改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卷十·诸子》:“‘《诗》失于齐鲁’当从龚氏本云‘《论》失于齐鲁’,谓《论语》也。上文已言‘齐韩毛郑,《诗》之末也’,不当重出。”

² 钟泰:《中国哲学史》,东方出版社,2008年,第169页、170页。

充”、“效果历史”¹⁾不谋而合，足可相互发明。

综上所述，王通承集七代家学而深造自得，其学抱负朝野、综衡南北、凌轹今古、平准经传，已具大儒规模。若天假以年，成就岂可限量也哉！惜乎造化弄人，王氏竟以英年早逝，其道潜而未光：

董常死，子哭之，终日不绝。门人曰：“何悲之深也？”曰：“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。之子歿，吾亦将逝矣。明王虽兴，无以定礼乐矣。”（5.37）

子不豫，闻江都有变²，泫然而兴曰：“生民厌乱久矣，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，吾不与焉，命也！”（1.5）

叔恬曰：“文中子之教兴，其当隋之季世，皇家之未造乎？将败者，吾伤其不得用；将兴者，吾惜其不得见。其志勤，其言征，其事以苍生为心乎！”（2.31）

王氏一生志在得君行道，当唐之兴而亡，命运之吊诡也一至于斯！此不但为个人之悲剧，亦中国文化之不幸。虽然，哲人岂徒生哉！文中寿虽不永，“其言则传”（王勃：《倬彼我系》），后世学者称引不绝，如唐人称其道“济贞观治平之盛”（司空图：《文中子碑》），宋人谓其“能以圣人之心处后世之变”（叶适：《水心别集卷八·王通》），明人称其“后世之大儒也，自孔、孟既没而周、程未兴，董、韩诸子未或有先焉者”（王阳明：《书同门科举提名录后》），清人称其“开唐之文教”（王夫之：《读通鉴论卷十五·宋文帝》），其学“岂今人之可望”（黄宗羲：《与潘次耕札》），近代学者目之为儒学复兴运动序曲³，当代学者则视之为理学先导⁴……由是观之，其人其学亦可谓不朽矣。今之学者，宁不有所感而欲有所为乎！

¹ 加达默尔：《真理与方法》，洪汉鼎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82页及第11、372、387页。

² 阮逸注曰：“大业十三年，炀帝幸江都宫，宇文化及弑逆。”按弑逆事在隋义宁二年三月（即大业十四年三月），而王通逝于大业十三年，阮注显误。“江都有变”当为“太原有变”，指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事。（参见尹协理、魏明：《王通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49页）

³ 冯友兰认为：“……在佛学方盛之际，有人如此推崇王通，以为能继孔子之业。直接推崇王通，即间接推崇孔子。视此为儒学复兴运动之一幕，则似可也。”（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，第800-801页）

⁴ 阎韬《王通的哲学与新经学》：“他重建儒学的权威的努力，他关于新儒学的一些思想，使他无意中成为理学的先导。”（任继愈：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隋唐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53页）